

*Carrier
and
Transmission*

一脉相承
载体与传播

杨斌 编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Carrier
and
Transmission*

一脉相承
载体与传播

杨斌 编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脉相承：载体与传播/杨斌编著.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9. 4

ISBN 978 - 7 - 5668 - 2508 - 7

I. ①一… II. ①杨… III. ①传播媒介—影响—世界史—研究
IV. ①G206. 2②K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20098 号

一脉相承：载体与传播

YIMAI XIANGCHENG: ZAITI YU CHUANBO

编著者：杨 斌

出 版 人：徐义雄

策划编辑：李 战

责任编辑：刘舜怡

责任校对：叶佩欣

责任印制：汤慧君 周一丹

出版发行：暨南大学出版社 (510630)

电 话：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网 址：<http://www.jnupress.com>

排 版：广州市韶艺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广州市快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6.375

字 数：150 千

版 次：201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19 年 4 月第 1 次

定 价：25.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 目 录 |

	引 言	001
	第一章 语言与口头传播	017
	第二章 文字的产生	025
第三章 刻写与实物载体	第一节 兽骨和甲骨文	040
	第二节 青铜器和铭文	045
	第三节 石刻和碑林	049
	第四节 泥板书	053
第四章 书写与实物载体	第一节 竹木与简牍	064
	第二节 帛与书	072
	第三节 纸与书	074
	第四节 莎草纸与纸草书	086
	第五节 贝多罗叶与贝叶书	095
	第六节 羊皮纸与羊皮书	097

第五章	第一节	印刷的产生与进步	111
印刷与纸书	第二节	印刷与中国古代出版	122
	第三节	技术创新与西方出版	129
	第四节	早期的出版管理模式	143
	第五节	载体发展与传播变化	144
	第六节	技术引入与中国近现代出版	148

第六章	第一节	莫尔斯密码与电报	164
数字技术与载体	第二节	新闻与报纸	166
	第三节	声音与电台	167
	第四节	图像与电视	169
	第五节	信息与互联网	170
	第六节	互联网与数字出版	173

结 束 语	187
-------	-----

参考文献	194
------	-----



引 言



近些年，随着数字出版这一新的产业模式的逐步兴起，我对文化如何以不同的物质为载体产生、演变和传播，以及人类在传承文明的过程中到底是以什么为依托不断前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和有关史料后，算是对中外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化载体及其传播方式有了粗浅的了解，进而对自己从事的出版事业的起源以及发展历史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更加深切的热爱。为什么本书叫“一脉相承——载体与传播”呢？这是因为通过研究人类文化载体本身及其传播方式，我发现，任何时候只要想了解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人们总能从载体中发现其踪迹。人类的历史和文明总是留痕的，时深时浅，时断时续，时远时近，总是以独特的方式被传播和传承下来。

经过研究可以发现，在人类真正开展出版活动以前，信息的发布和传递主要借助声音、肢体动作和图形图像等，这些方式已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期。而出版工作与其之前的传播活动

的显著区别在于它传播的内容是出版人以某个特定的视角，经过认真筛选和加工后呈现出来的，出版的载体具有多样性，不仅有图书，还有音频、视频等多媒体信息。文字的出现，虽然不能等同于出版的起源，但早期以传播为目的的实物刻画已经充分包含原始的出版观念——通过一定的符号和载体向他人传递信息。而书籍，作为传播文化中很有仪式感的载体，是文字书写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也常常是挑战已有规范和权威观念的重要载体，其影响深入人心，以至于许多人耗尽平生去研读《道德经》《论语》《圣经》等著作。

内容、载体是构成图书的基本元素，辅之以基本的生产技术、工艺以及必要的装帧设计，图书才得以产生。造纸术发明之前，在中国，图书的载体主要为竹简和缣帛，为简牍制，中国处于图书的竹木简牍时代。无论我们从哪个方面研究书籍的诞生，把它作为物品、艺术品、独特生产方式的产物，抑或是作为独特的文化象征，几乎都要回到一个关键问题上，那就是书写在文化文明和商业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是重要的表达方式。

可以说，不同信息载体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且该差异存在于人类历史文明进程的不同阶段，值得我们去思考和研究。本书所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传承人类文化的载体。按照载体的代表性可分为六个阶段：语言与口头传播阶段；文字的产生阶段；刻写与实物载体阶段；书写与实物载体阶段；印刷与纸书阶段；数字技术与载体阶段。

西方的实物载体最早有青铜器、泥土和莎草纸，然后是羊

皮纸，最后是纸。中国的实物载体相比较下丰富一些，如甲骨、青铜器、石壁、竹简、缣帛、纸等等。为何把两河流域的泥板，埃及、希腊和罗马等国的莎草纸，希腊罗马时代和中世纪初期的羊皮认定为悠远的传播载体？又为何中国史前祖先早早开始制造木器、骨器和石器等工具用于记载最简单的内容？这是因为从那时起，人们就开始制造承载和传播文化的工具。最早的这类载体往往选择随手可得的物体，可能只是一根木棍，上面的刻痕也只是用来表示附近动物的数量；或者用岩石圆木做标记圈定土地范围，告诉别人那是属于自己的领地。毋庸置疑，我们可以认定这些载体是传播交流初期的重要工具，人类一直根据实际需要，通过创造传播载体去扩展传播的范围。传统载体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有利于空间上的延展和时间上的延长的结实载体，如石板和泥板，它们结实耐用，可以长时间保存内容而无任何改变，但不容易生产、使用和运输，不利于传播；另一类载体十分轻便好用，如莎草纸和羊皮纸等，使用方便、容易运输，能够进行远距离传播，但容易破碎和霉烂，保存时间比较短。

传播是一种涉及文化内容的活动，是信息的互换。近年来，有证据显示，信息交流和交流技术兴起于史前史晚期（约公元前50000年到公元前10000年）。在公元前12000年至公元前4世纪，两河流域和古埃及文明之所以能得到蓬勃发展，是基于文字的产生。历史记述始于文字，也就是记录在泥板、石头和莎草纸上的符号；现在的我们难以理解这些文字，但是我们

通过深入研究，反复论证，学会了破解和阅读这些文字。这些古老的记录明确地告诉我们，人类开始有记载的历史大约始于5000年前的两河流域、埃及和亚洲，随着象形文字早期形态的出现而出现。

在人类历史上，无论是以口头的形式还是书面的形式，传播的载体类型、范围和包容性一直在稳步增多、拓宽和增强。在现代人看来，这一切显得奇异而似曾相识，在社交媒体环境中，信息沿社会关系网在人们之间流传，四面八方的人在参与同一场讨论，组成“分散的群体”。罗马人靠莎草纸和信使传递信息，现在的人用微信（WeChat）、微博、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和其他互联网平台来传递信息。但仔细思考，会发现这两种相隔2000年的信息传播载体在基础结构和发展态势等方面是非常相似的：两者都是信息沿载体从一个人横向传给另一个人——而不是由一个非人的中心来源发散传播。

知识信息更是通过不同的载体被大量复制，广泛流传，而且至少已经存在了2000年，不同的只是传播范围和复制规模。书籍作为知识信息的载体，更早地拥有了更大的力量，这些知识信息的影响超越了它们被构思或书写的时代。一部作品的流传往往是由写作、出版、发行、接受等环节组成，被思想、政治、法律、宗教、商业上的压力和社会行为、趣味等所围绕和影响。

当人类学会书写的时候，书籍也就同步出现了，即使其形

制还很原始，不成体系，与现代书籍的外观也完全不同，但它的的确确已经产生了。如果我们把书籍定义为将人们的经验用文字和图像的形式记载于一定的载体上，以便于保存、传播，那么，商朝的甲骨文就是最早产生并保存到现在的“书籍”了。在古印度，人们还在树叶和树皮上刻写文字，记录自己的思考和感受。

《旧唐书》上记载：“天竺国书于贝多树叶以记事。”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贝叶经”。另外，铸有金文的青铜器，也可以称为一种早期的“书籍”。除甲骨、青铜器、石壁等载体外，在古代用于记录文字的载体还有很多，如陶器、砖瓦、兽皮等，它们在人类文明史上都显露过无与伦比的灿烂光辉。然而，最接近今天书籍形式的，是竹简。

在信息载体中，传播范围最广、将人类的文明进程推进最多的书籍的产生和发展，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通过研究和追溯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图书的生产消费过程、产品和市场结构演变、对文化的影响等等。书籍对文化和个人的影响也并非可以轻易得到充分的解释，其关乎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例如书籍在人生命中的不同阶段对其有不同的影响。正如杰罗姆·麦克盖恩（Jerome McGann）在号召对“文本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 of texts）进行研究时所指出的那样，不同的物质形式会促使读者用不同的方式来阅读文本。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则是最早以书史为背景提出这些问题的学者之一。1982年，他回顾了书史领域的研究史，宣称其在研究方法上支离破碎，简直像是“跨学科的混战”，同时，他预见这

是一个书史“可能在学科体系中赢得一个与科学史和艺术史比肩的位置”的时代。自那时起，一波接一波的书史研究兴起，印证了他的观点，特别是致力于研究印刷文化史和书史的学术性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在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其他国家或地区相继出现；出版商通过发行关于这一主题的学术专著、手册、读本和杂志而茁壮成长；专业组织努力推进该领域的学术研究；学者们通过专门的国际会议、研讨会和座谈会进行大量有价值的对话和探讨。书籍推动变革的主要积极意义在于书籍所使用的是各种语言，欧洲统一的拉丁文化最终因各国语言的兴起而瓦解，另外借助印刷机，各国的方言得到蓬勃发展。

载体与传播的研究是不同于书史研究的。本人认为载体是根据人们对传播知识的现实需求而不断变化的，内容生产和技术改良也始终在极具活力地向前发展，并成为人类社会文明的一部分，研究方法是跨学科的方法。

沃尔特·奥恩（Walter Ong）、杰克·古迪（Jack Goody）、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提出了西方文化史中以书为载体的发展，可分为三个关键的阶段：第一阶段，从口头到书写（再细分为字母的发展，语言的出现，经济贸易结构的出现，书写工具——墨、纸、册页抄本——的获得，以及书写系统的成型）；第二阶段，从书写到印刷（手抄本文化和印刷的发展逐渐在文化和社会机构中得到应用，在越来越工业化的社会中为大众提供消费材料）；第三阶段，从印刷品到用计算

机处理的文字内容（我们正在经历的转变阶段）。互联网产生之后催生了新的出版形态——数字出版。麦克卢汉在划分阶段的同时，也强调了书写和印刷对口头文化的破坏性影响，认为书写导致“耳朵的魔幻世界与眼睛的中立世界分道扬镳，这种分离使个人得以从部落组织中脱颖而出”。他提出，阅读文本和印刷书籍的私密性质，无可逆转地改变了人类的互动模式和文化的传播模式。对于麦克卢汉来说，这样的分化不是书写文化发展的结果，而是谷登堡所发起的印刷革命所造成的结果。

沃尔特·奥恩在其经典著作《口头与书面》中，提出出版与印刷的引入在社会交流中留下了一种新“意识”的烙印——书写，“在视觉空间里重新建构了原先的口头语言”，而印刷“把语言更确定地植入这一空间”，其结果是人们在认知经验中植入了线性，即一种能够很容易地对材料加以检索的空间构成感，并促使人产生一种终止感——“一种在已被完结、已达到完成状态的文本中找到的感觉——印刷品把思想封装进成千上万本在视觉和物质上完全一致的拷贝中去”。它是“一种意识的形态，一种信仰和观念的结构，一种社会建构的主观性”。这种观点更加印证了不同的传播载体对人和社会的影响不同。

在古代，书写文化不仅受到书写工具和载体的限制，也受到写作方法的影响。西方人在学会用活字印刷术复制字母的书写形态以后，纸张的造价更加低廉，字母表便得到充分使用并发育成型。古代书籍生产及其采用的文字风格得到了

很大的关注，但是书写文化并不是仅仅建立在一堆铭文上的。苏美尔人的文字最早写在泥板上。楔形文字成为标准字形后，即使在坚硬的石块上刻写文字存在困难，人们也约定俗成地刻写成这种字体。现存最早的刻有楔形象形文字的泥板书出土于苏美尔的乌鲁克古城（Uruk），建造时间是公元前3200年左右，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字记载之一。最初楔形文字的写作顺序是从右到左，自上而下，竖排书写，但这种书写方式最大的缺点是已写好的字符很容易被刻字的手蹭掉，于是人们把书写的方式改成了从左到右的横向书写。在古希腊，石头和焙烧的泥板为希腊人提供了最早的书写条件，就像现在的纸张那样。据希罗多德（Herodotus）记述，欧洲最早使用的书写材料是羊皮，即兽皮，但从发掘出来的文物数量上来看，羊皮纸虽然质量上乘，但其原料资源却非常有限，流传比较广的还是埃及的莎草纸。研究成果告诉我们，在庇西特拉图（Peisistratos）统治雅典的时期，即公元前6世纪中叶，《荷马史诗》经过了仔细修正并书写在莎草纸上。在公元前5世纪上半叶，雅典人使用莎草纸的数量不断增加，在莎草纸上用蜡版做记号也越来越普遍，单张的莎草纸可以粘贴在一起，形成长轴，也可以卷起来。如果想寻找卷轴上某个词，便可以舒展卷轴。但由于莎草纸原材料的匮乏，古代雅典读者的阅读条件是不充分的，他们遭遇到一些载体稀缺的困难。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在当时的雅典，儿童在小学里学认字，用什么样的书写材料比较方便呢？答案

恐怕是沙土和石板。因为沙土和石板都比较容易得到，也可以抹掉字迹后反复使用。后来，西方的文字通过接连不断的文化征服逐步走向标准化和规范化。

在中国，最早的书写工具是毛笔。毛笔发明于公元前3世纪，可以用来绘画，也可用来在竹简上写字。毛笔的使用，意味着从图形到象形文字的演变。墨水起初用灯灰制作，在公元220年至419年间逐步改进，最后改良出永不褪色的墨水。

印刷的出现是历史上重大的科技变革之一，这项发明被称为“历史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当然印刷机更适合这一称号，它使知识的广泛传播成为可能，并且推动了新形式的语法和语言表达方式的繁荣，而所有这些目标的实现都要借助于新载体——纸张，一种比羊皮卷要便宜很多的载体。纸张的使用引发了一场极其重要的革命，它让人们能够用一种普通的材料去代替昔日昂贵的材料，从而促进了人类思想成果的广泛传播。如果没有纸，就不会有这么多人从事写作，印刷术对人类社会进步的作用也将大打折扣。

印刷的进步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以一种不确定、不可靠的整合过程为特征曲折前行的。书籍是人类共识的体现，也是一种集体认可的物质呈现，它成为连接各种工作的枢纽，以不同的视角影响着每一位阅读者。印刷文化环境的特点是，当书籍被生产、使用和传播时，它们被认为体现了标准化、传播性和固定性的状况。书籍可以在任何地方被标准的工具和技术原样复制，这样，手抄本生产中那些导致文本被篡改的内在因

素就被去除了。

印刷机的出现理所当然地转变了传播模式。在西欧的知识群体中，由于新技术的应用，资料搜集、储存、检索和交流的方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其结果就是艾森斯坦（Eisenstein）所说的“印刷的固化作用”。这说明了印刷文化的创新增强了社会生产和传播信息的能力，通过创立“一系列技术和规范，使人类可以用一种令人生畏的高效率来使用世界上记录下来的知识储备”。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述，就是“印刷的固化作用”包括“印刷书能够给予印出来的文字和思想以牢固、经久的形式，能够通过大量发行在页面上、文字组织形式一致的相同拷贝来传播这一客观化了的语言实体”。从本质上看，印刷和印刷品生产是模板式的、不可变化的，对作品内容不会有什么影响，除非印刷工人犯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如丢失或放错铅字、在装订过程中弄乱书页、遗漏文本的某些部分等等，这些错误当然会对作者的原始意图造成改变。唐·麦肯锡写于1960年的《思想的印刷者》揭示出一部文本的物质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的生产环境，他从伦敦印刷商人威廉·H. 鲍伊尔（William H. Bowyer）的通信、出版目录和商业账册中搜集到了原始资料，证明17、18世纪英格兰的印刷作坊并不是那么井井有条的，而是以“并发生产”（concurrent production）的方式为主。工人们的工作习惯差异相当大，通常是多部书同时印刷，排版和印刷并非只由一个印刷工人或编辑承担，而是由几个排字工人和印刷工人同时承担，以一种复杂